

逃避统治的艺术

修订译本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James C. Scott

[美] 詹姆斯·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修订译本

[美] 詹姆士·斯科特 著

王晓毅 译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Copyright © 2009 by Yale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 (美) 詹姆士·斯科特著；
王晓毅译。—2 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8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6627-5

I. ①逃… II. ①詹… ②王… III. ①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史—
研究—东南亚 IV. ①D0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0175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曹秋月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75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 数 393 千字

印 数 06,001—11,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如果说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那么也就可以说，没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他们反抗
国家的历史。

——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
《反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前 言

IX

赞米亚(*Zomia*)是一个新的名字,包括了从越南中央高原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或自治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民族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地理上,赞米亚也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因为这个巨大的区域位于9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却不在任何一个的中心上,而且跨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东南亚、东亚和南亚),此外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它的生态多样性以及与国家的关系,正像跨国家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一样,赞米亚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

我这本书的论点简单、有启发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赞米亚是现存最大的地区,那里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但它的时间屈指可数。虽然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还是这样自我管理的人群;今天,从谷地王国的角度,他们被看作“我们的活祖先”,“在有水稻种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我们”。与此相反,我主张最好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过去2000多年中,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建设工程的压迫——

X

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也许更适合被称为碎片区(*shatter zones*)或避难区。

实际上,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他们分布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和亲属结构,他们适应性极强的民族认同,以及他们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热衷,这些都有效地帮助他们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也防止他们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他们大多数人要逃避的国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国汉王朝。逃避的历史可见于许多山地传说。尽管公元1500年以前的资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这之后的文献足够清楚,包括明清时期政府经常发动针对山民的战争,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这导致数百万人寻求避难所。此外关于逃避缅甸和泰国国家发动的劫掠奴隶行为的记载也同样丰富。

尽管赞米亚所横贯的亚洲范围已很广阔,但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在这之外引起共鸣。

无论是当代或历史上,大量有关国家形成的文献都不曾注意到它的另一面:蓄意和反应性的无国家历史。这是一个逃避者的历史,离开了逃避者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国家的形成。正是他们造就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

在国家形成和非自由劳动力体制中,许多人群的历史被排斥在外,包括吉卜赛人、哥萨克人、新世界中由逃避西班牙殖民归化区(*reducciones*)统治的人所形成的多语言混杂部族、菲律宾人、逃奴群体、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游牧民族(*San-Bushmen*)等。在这本书中,这些历史也被涵盖。

我的论点推翻了那些被广为接受的有关“原始主义”的论调。草原畜牧业、觅食、轮耕和分支世系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经常是“次级适应”，一种人们采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活动地区、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管理。对于那些生存于国家管制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逃避与山地中派生、模仿和寄生的国家形态是一致的。

我的观点要解构文明历史中关于“野蛮”、“生”和“原始”的论述。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这些词汇实际意味着“未被统治”和“尚未被纳入国家体制”。在有关文明的论述中从来不xv考虑人们可能会自愿走入野蛮，因此这些状态被谴责和认作非正统。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族群或“部落”开始的地方——在罗马帝国和中国都同样如此。

生存形式和血缘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先天赋予的，由生态和文化所决定的。但是通过分析不同耕作形式、作物种类、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人员流动特点所蕴含的逃避价值，我宁愿相信这些所谓的“先天赋予”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

山区成为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逃避国家人群的庇护所，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话题。我发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这为理解前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空间和国家建设困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对这本书我是唯一该负责的人，我是作者。在我开始道歉和对一些批评进行预先回应(我知道是徒劳)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个说清楚。我可以预见到这些批评正向我压来，甚至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经常被指责为是错误的,但很少被指责为含糊不清或晦涩难懂。这本书也不例外。不可否认,我对于东南亚大陆的山民所持的主张是非常大胆的,但是我相信,也许会有细节上的错误,总体来说我的主张是正确的。当然,对错的判断并不由我掌握,而是读者和评论人。但是对于书中的主张,这里我要强调三点:第一,这里没有原创的内容。就是说,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想法都不是来自我。我所做的只是从我仔细阅读过的大量文献中看出了一种内在的规律和观点,把这个观点提炼出来,看它能把我带到哪里。如果有任何有创造性的地方,那就是理解这种格式塔式整体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融会贯通。我知道我引用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它们的原创者可能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已经告诉了我,其他人好在不会抱怨了。我在他们的意见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他们无须负责,正像别人如何使用这本书内的观点与我无关。

XII

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尽管不是特别好的,但的确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老历史学家,老的两个含义都适用。我熟知历史学家的职业病,比如他们可能准备写作18世纪历史,但结果大部分写的却是17世纪的事情,因为这对要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也毫不例外。我在阅读有关山民的民族志和缅甸军队在少数民族地区侵犯人权的报告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为古代曼陀罗(mandala)*王国运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建设过程所吸引。我的有关东南亚的前殖民和殖民时代的研究成果要归功于两门不同的研究生阅

* 曼陀罗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圆圈,佛教的艺术中经常采取圆形的方式。曼陀罗国家往往指中心权力向周边扩散的国家形式。——译者注

读课。一门是阅读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教科书,就像是知识分子的新兵训练营,我们读的都是这方面的基础著作,也就是那些多数学者书架上有但却不好意思承认没读过的书。最开始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剑桥东南亚史》,让我们耳目一新。第二门课是关于缅甸的,也是从基础读物开始。

由此引出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或者甚至更早,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这些技术——包括铁路、全天候公路、电话、电报、空中战斗力、直升机,以及现在的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因此我的分析也基本没有用了。与此相反,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现在忙于把其权力伸展到最远的边界,将那些弱者或尚未被统治的区域清扫收编。由于需要“部落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希望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生产能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并”的战略,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认为忠诚并渴求土地的谷地居民被移居到山地。如果我的分析不适用于20世纪后期的东南亚,别说我没早警告你们。

最后,我担心这里描述的有关种族形成的激进建构主义个案会被误解,被当成是在贬低甚至诋毁那些勇敢的人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民族认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无一例外,所有的认同都经由社会建构:不论是汉人,还是缅甸人、美洲人或丹麦人。这些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认同,经常首先是由强有力的国家构造的,比如汉人想象出了苗人,英国殖民者造出了克伦族(the Karen)和掸族(the Shan),法国人制造了加莱族(the Jarai)。不管是被生造还是被强加的,这些民族都选

XIII

择了某种特性作为自己的理想,尽管有些特性比较模糊,这包括宗教、语言、肤色、饮食,以及生存的意义。这些分类,一旦通过疆域、土地所有权、法庭、习惯法、指定的领袖、学校和文字被制度化,都可能成为强烈且充满活力的认同。如果这种认同为更大的国家和社会所诋毁,反而更容易促使形成抵抗和挑战的认同。这样构造出来的认同与自我奋斗的英雄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得认同成为一种荣誉。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具霸权的政治单元,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自我确认的过程往往采取排斥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形式。因此对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谋求某种形式的独立和认可的掸族人、克伦人、钦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满怀敬慕。

我在知识上至少从五位“死去的白人”中学到很多——将来我也会加入他们。他们是先行者,我沿着他们的道路蹒跚到这里;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发现这条路。最早的一位是皮埃尔·卡拉斯特(Pierre Clastres),他在《反抗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中对南美洲被征服以后逃避国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国家(state-preventing)的本土居民所做的大胆解释被后来的资料证明是很有洞察力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汉族中国和边缘地区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透彻的远见卓识帮助我看到,在中国西南边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关于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Berber-Arab)之间关系的分析使我了解到,君权和税收无法到达的地方就是“族群”和“部落”的空间。所谓的“野蛮人”(barbarian)是国家描述那些自主治理、尚未臣服的人民所用的词汇。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

不断地参阅爱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才能有所成就。很少有著作这么“值得深入思考的”。最后我要感谢詹姆士·G. 斯科特(James G. Scott),即施韦·尤义(Shwe Yoe),他身兼军队的将领、殖民地的官员,《上缅甸志》(*Gazetteer of Upper Burma*)的编纂者和《缅甸人》(*The Burman*)的作者诸种身份。我们不是亲戚,但是因为我从他敏锐的观察中受益匪浅,而且按照缅甸星象学的测算,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缅甸名字,所以我也采用了他的缅甸名字以取悦他的神灵。

那些强烈质疑自命的统治者如何来教化边缘人群的论述,以及重新审视边缘人之所以会被边缘化的著作激励并指导了我的研究。贡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30年前出版的经典小书《避难的地区》(*Regions of Refuge*)对拉丁美洲大陆的研究相比卡拉斯特得出了更普遍的结论,而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和弗兰克·所罗门(Salomon)又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和阐明了这一结论。与我所关注的地理区域接近,罗伯特·郝夫纳(Robert Hefner)关于爪哇腾格里高地(Tengger Highlands)和乔弗瑞·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对马来西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的研究都是极具说服力的杰出案例,他们鼓励我用类似的观点去看赞米亚。

赞米亚的概念要完全归功于威利姆·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他预见到这样一块向西延伸到印度的巨大高地边界区(在他的看法中甚至更大)具有鲜明的特色,应该成为一个有特定称谓的研究对象。在陈述“赞米亚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时,他质疑了传统的地区(area)或区域

(region)的概念。我读了他关于这个词令人信服的议论后,立即报名成为拥护赞米亚的军中(心理战争分支)一员。威利姆·我,还有其他几位同事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召集第一届国际赞米亚研究大会。范·申德尔关于孟加拉边境地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表明如果我们真正听取他的指导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如果有耐心,或者想做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那么至少应该再包括一章讨论江河湖泊中的避难所。我只是顺带提及他们,却遗憾地没能好好地讨论他们。如同山上流动的居民一样,东南亚海岛中人数众多的水上游民(*orang laut*,海上游牧民,海上吉卜赛)也是在海岛中不断航行,居无定所。如同许多山民一样,他们也有尚武的传统,可以很容易地从抢掠海上的运输船和掠夺奴隶,变为马来王国的海上警卫或水军。他们位于主要水上通道附近,可以迅速地进攻然后消失,形成了一个水上的赞米亚,这应该在我的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像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在鼓励我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时所说的,“海洋的面积更大,比山地和森林更广阔。可以看到现在的海盗仍然可以沉着轻松地躲避开七国集团和新加坡等的围剿”。但是有目共睹,这本书已经太厚了,而且我必须将这个主题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继续: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经出色地开始了这一工作。

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兴趣与我完全吻合,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完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雷曼(F. K. Lehman)、漆莱(Chit Hlaing)和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 Connor)文章中的真知灼见和深刻含义,让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他们的作

品。维克特·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一位从事东南亚国家建设比较研究的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早于我们就高举赞米亚(或如他自己所称的东南亚丘陵地区)旗帜的让·米肖(Jean Michaud)则是主要的对话者。所有这四位学者都展现了高度恢宏的知识境界(intellectual largespiritedness),特别是他们与我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尽同意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但他们应该知道,正是他们使我更聪明,尽管可能还没达到他们期望的程度。此外,我还要感谢让·米肖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东南亚丘陵地区居民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中的许多段落来做我的本语表。

有许多人阅读了部分或全部的书稿并坦率地给我提出了建议,尽管这占用了他们做其他更好事情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讨论变得更细致和严密。下面的名单不分先后:迈克尔·艾达思(Michael Adas),阿吉·斯卡瑞亚(Ajay Skaria),拉玛昌德·古哈(Ramachandra Guha),塔尼亚·李(Tania Li),本·安德森(Ben Anderson),迈克尔·昂-特文(Michael Aung-Thwin),今村正雄(Masao Imamura),还有历史学家U. 它·屯·毛昂(U Tha Htun Maung)和U. 索易·科尧·图(U Soe Kyaw Thu),考古学家U. 屯·登(U Tun Thein),地理学家亚瑟·皮(Arthur Pe),乔弗瑞·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杜姗姗(Shan-shan Du),曼迪·萨丹(Mandy Sadan),迈克尔·哈撒韦(Michael Hathaway),瓦尔特·科瓦德(Walt Cowand),本·科克里克特(Ben Kerkvliet),朗·赫林(Ron Herring),英德拉尼·查特杰(Indrani Chatterjee),钦·毛昂·温(Khin Maung Win),迈

克尔·多芙(Michael Dove),詹姆士·哈根(James Hagen),简-巴特·基瓦尔德(Jan-Bart Gewald),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颂差·文尼查克(Thongchai Winichakul),凯瑟琳·鲍威(Katherine Bowie),本·基尔南(Ben Kiernan),帕米拉·麦克艾尔威(Pamela McElwee),南斯·卡宁汉姆(Nance Cunningham),昂·昂(Aung Aung),大卫·鲁登(David Ludden),雷奥·卢卡森(Leo Lucassen),珍妮思·斯图加特(Janice Stargardt),托尼·德(Tony Day),比尔·克劳斯纳(Bill Klausner),米亚·丹(Mya Than),苏珊·奥多诺万(Susan O'Donovan),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马丁·克莱(Martin Klein),裘·古尔第(Jo Guldi),亚顿·毛昂·萨格梦(Ardeth Maung Thawngmung),波·波·聂(Bo Bo Nge),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玛丽·卡拉汉(Mary Callahan),恩里克·梅尔(Enrique Mayer),安其里克·豪格吕(Angelique Haugerud),迈克尔·麦戈文(Michael McGovern),吴丹敏(Thant Myint U),马克·爱德曼(Marc Edelman),凯文·海普纳(Kevin Heppner),克里斯汀·仑茨(Christian Lentz),金安平(Annping Chi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杰夫·韦德(Geoff Wade),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安德鲁·特顿(Anrew Turton),石川伸(Noburu Ishikawa),克农·卜利兹勒(Kennon Breazeale),以及凯伦·巴克(Karen Barkey),等等!我在这个名单中还隐去了四个同事的名字,他们没有给我意见。你们自己知道都是谁。该不好意思吧!当然如果你们体力不支无法把打印稿搬到桌子上,请接受我的歉意。

我还想感谢几位同行的帮助。郝力菲尔·强森(Hjorleifur Jonsson)的《绵的关系》(*Mien Relation*)是一部见解独特的

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想法,特别是有关山地居民认同和社会结构韧性的论述。迈克·格力弗斯(Mikael Gravers)教会了我很多有关克伦族人以及他们笃信千禧年的世界观基础。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无比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且为我制定了一个阅读计划,我现在仍在努力完成。最后,我还从五位同事那里受益良多,多年前我和他们一起开始研究“本土和官方的认同”,他们是: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平克尧·朗格马斯瑞(Pingkaew Luanggaramsri),万科丸·步戴(Kwanchewan Buadaeng),楚萨卡·威特雅帕(Chusak Wittayapak),此外还有珍妮·司徒珍(Janet Sturgeon),早在有赞米亚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实践中的赞米亚研究者(Zomianist)。

在1996年,我的同事萧凤霞(Helen Siu)说服我作为讨论人参加一个中国边界和边民的研讨会。由她、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科大卫(David Faure)组织的这个研讨会非常引人深思和充满生气,由此产生的许多想法都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这个研讨会所形成的由柯娇燕、萧凤霞和苏堂棣(Donald Sutton)编辑的《边缘的帝国:现代中国早期的文化、种族和边疆》(*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集合了原创的历史、理论和民族志。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找到我的方向是如此迟缓,但是有许多机构收留并支持了我。我在帕罗奥多(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开始阅读东南亚高地的背景资料和有关国家与流动人口关系的资料,在那里,阿历克斯·凯萨(Alex Keyssar)、

南希·科特(Nancy Cott)、托尼·贝宾顿(Tony Bebbington)和丹·西格尔(Dan Segal)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这种阅读持续到2001年春我在奥斯陆发展与环境中心,在那里,德斯曼德·麦克尼尔(Desmond McNeill)、西格纳·哈维尔(Signe Howell)、尼娜·维特泽克(Nina Witoczek)和贝昂特·哈格威特(Bernt Hagvet)的知识和魅力都使我受益匪浅。在钦·毛昂·温宽容的关注下,我认真地跟随缅甸民主之声电台学习缅甸语。在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国际发展研究生院社会与全球化系的时候,我完成了这部书的第一稿。我想记录我对克里斯汀·隆德(Christian Lund)、普雷本·卡索尔姆(Preben Kaarsholm)、鲍迪尔·佛尔克·弗里德里克森(Bodil Folke Frederiksen)、因格·詹森(Inge Jensen),以及奥雷·布伦(Ole Brun)的感谢,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鼓舞,并使我的访问非常愉快。

在过去的20年中,我的知识支柱主要来自耶鲁大学的农业研究项目。土地改革的支持者(agraristas)、学者、演讲人、研究生和我在教学中的同事不断地给我以信心,使这个项目成为一个知识的聚会所,既欢乐又充满挑战,既友好又很艰苦。凯·曼斯菲尔德(Kay Mansfield)自始至终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和灵魂,像指南针一样确定我们的方向。我的同事K. 希瓦拉马克日什南(K. Sivaramakrishnan,又名Shivi)、埃里克·沃比(Eric Worby)、罗伯特·哈莫斯(Robert Harms)、亚伦·阿格拉瓦尔(Arun Agrawal)、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琳达-安娜·雷布汉(Linda-Anne Rebhun)和迈克尔·多芙(Michael Dove)在我的持续学习中都伸出了慷慨的援助之手。在他们之中,迈克尔·多芙和哈罗德·康克林

XVII